



吴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高燮初

一、前言

吴学是吴文化学的简称，这是吴学研究所建立以来以吴地区域性大文化为研究内涵提出来的学术概念，也是吴文化研究在当代的发展。

本文研讨的内容，是无锡吴学研究所从 1984 年起所进行的吴文化研究综合性的回顾。

吴学研究所是中国在改革大潮中由无锡县（今锡山市）农民办的一所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它挂靠在同样性质的中国第一座以吴地区域文化为内涵的文化主题公园——吴文化公园（亦称吴文化

博览苑)内。由于建园、所的时间短,属于初创阶段,不揣简陋,撰写成文,就正于各界。

吴文化产生于长江下游金三角地区,它是中华文化的分支,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子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它与中原文化融合,与周边区域文化交流和互补,形成绚丽多彩、独树一帜、后来居上的文化风貌。当今,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日益显示出举足轻重的地位。

吴地以江海湖河为依托,自古到今不论是物质生产、人民生活、民风民俗、精神道德、文学艺术,无不与水发生密切联系。水之流动不居,智者乐水,民性智灵富有开拓精神。因此形成了融合、吸收、辐射的历史功能。历史上北方向吴地三次人才大迁移(南北朝、五代、两宋)促进了吴地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海运发达,又将中华文化传播到海外,古代的日本、东南亚、朝鲜都受到吴文化的浸润。从明清到近代,又首先成为吸收欧美西方文化的窗口,向内地辐射。综上所述,吴文化是水的文化,是最基本的特色。

当今中国 12 亿人正在做一篇大文章,就是搞富国富民的现代化。19 世纪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炮火侵略的硝烟中被惊醒过来,亿万中国人民用血和生命进行探索,用长达 150 年的时间,找到了“改革、开放”之路,其核心就是研究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如何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吴文化地区近百年来年的发展史,恰恰为形成这条道路,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中国长达 2000 年之久的超稳定结构的农业社会,如何与世界工业社会对接,占 80% 的农业人口,90% 国土面积的农村的现实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主阵地在农村,实现现代化的主力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我们对吴文化的提出和研究,就是要认识、开发及应用。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金三角区,就是吴文化覆盖区。从古到今在经济、文化上成功的经验是研究的对象。我们认为,吴学研究是当代新农民在改革大潮中对文化的追求。

我们的研究宗旨：从区域文化研究来探索新的历史发展道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从另一方面，发扬弘大中华文化，唤醒国魂，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主体文化，来抵制“全盘西化”、“崇洋媚外”等消解民族正气、腐蚀民族意志的浊浪秽气。

我们首创了以研讨、展示、结集三结合立体型的新型形式。我们以研讨吴文化来吸引全国（乃至海外）学者来研究吴地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及时汇辑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在更深更高层次传播吴文化。

二、历史

（一）对吴文化源流的研讨

中华民族 5000 年的历史文化传统是国内各族人民世代传承和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它是民族之魂，立国之本。它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由于它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从古到今民族、部族众多，在中原华夏族的周边都在创造着风貌各异的区域文化。吴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百花苑中的一支奇葩。它以万年前太湖三山旧石器文化为序幕，直到当今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并且越来越显示出它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巨大作用。

分期：我们对吴文化的界定，就是把吴文化作为一种动态性的历史流程来认识和考察。我们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先吴文化—吴国文化—后吴文化（吴中文化）。

先吴文化指的是江南吴地土著居民荆蛮（或说百越族），创造的古文化。

吴国文化指的是商末岐山下的周族太伯、仲雍南奔吴地梅里（今无锡梅村镇）与当地土著荆蛮族结合的吴国文化，从建立句吴国传至夫差被越灭掉，前后约 700 余年。

后吴文化：从越灭吴、楚灭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转为大一统

下的一个地区，我们管它叫吴地，以后经历王朝更替，统一与分裂，作为一个地域，它的文化继续存在与发展。并且与中原文化及各区域文化呈现出同中有异，你中有我独特的地域文化风采。我们管它叫后吴文化。

综上所述吴文化经历了自身的历史发展阶段。先吴文化应是吴文化的萌生阶段；吴国文化是发展的初级阶段；后吴文化是发展的辉煌阶段。

综观发展的全过程，吴文化有以下特点：

1. 先吴时期地下遗存发掘表明，吴人以古农业、渔猎业、手工业并存构成多型的经济结构，这一传统经历上万年的发展，形成发达的农业、副业、手工业、商业的综合经济，成为全国商品经济活跃，市场经济观念开放，产业结构的多重组合的先导地区。

2. 吴人在军事政治上大起大落，以小胜大，以弱克强。吴国后期阖闾、夫差父子西破强楚，南克越国，北上称霸，但昙花一现，国破人亡。秦末群雄逐鹿中原，项羽叔侄起兵吴中，以江东八千子弟兵摧毁强秦主力，横扫六合，威镇诸侯，成霸王之业。瞬间，霸业消歇，自刎乌江。这反映了这一区域的内聚力雄厚，爆发力强。容易取得突破性发展，但中国历史的发展，统一是大趋势，吴地历史上的暴兴骤落，客观地反应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

3. 民风由吴国时的尚武任侠转向汉以后的崇文、重商，这一历史变化，造成吴地人文荟萃，人杰地灵、人才之盛确保了这一地区的持续发展长期处在全国前列。也使这一地区文化底蕴深厚，容易吸收异质文化来丰富发展自己。

4. 吴文化在文化上的几次辉煌构成了又一特点：以孙武、伍子胥为代表创立的军事学说，成为古代军事学的全面总结。孙子兵法成为世界军事学的一座高峰。东汉末佛教文化传入吴地与魏晋道教文化在吴地的大发展，形成吴地儒学、佛教名宗大派、道教茅山的上清派等三教合一，创造了充满活力的吴地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灿烂的篇章。

5. 在政治上,建康成为六朝的华夏分裂偏安江南后的政治中心,继之成为五代的南唐、吴越的政治中心。以后南宋建都临安,一直到明初朱元璋又以南京为统一的中央首都的升格,朱棣虽把都城迁燕京,但仍维护南北二京制。延至近代,中华民国建都南京,这说明吴地不仅以经济文化逐步升格为全国的 center,居领先地位,也出现了政治中心逐步南移的历史轨迹。

(二) 吴文化研究史的探讨

1. 古人对吴文化的探索

先吴文化由于文献阙如,只能以地下出土文物对吴文化进行探索。先吴文化实际上是考古文化。本世纪 30 年代以宜侯矢簋等青铜文物的铭文为依据,再以在各地出土的残简、帛书等文字内容印证先秦文献对吴国文化作了探究。先秦的一批史书如《左传》、《国语》等涉及吴国的记述成为吴地文化研究的滥觞。以司马迁的《史记》有关记述吴国、吴人的篇章成为古代研究吴文化资料的重点。以后出现的《吴越春秋》、《越绝书》以及唐陆广微的《吴地记》、宋范成大《吴郡志》、元陆友仁《吴中旧事》、明清大量吴地方志等著作扩大了研究吴国文化的范围。

清初顾亭林正式揭开了吴学研究的序幕,被梁启超誉为吴学研究第一人。他把吴文化作为实学,提出了“经世致用”注重国计民生的务实研究。

2. 吴越史地研究会研讨述略

本世纪 30 年代,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吴文化研究在这大背景下正式进入了开创阶段。发起者卫聚贤,是个学养深湛的业余学者。他用自己的薪水的一半充作研究经费,因此,吴文化研究发起时就带有强烈的民间色彩。他提出了“吴越文化”这一学术概念,并撰写了系列的理论文章,加上其他十几位学者的论述,结集于 1937 年 7 月出版的《吴文化研究论丛》,成为中国第一部研究吴文化的专著。卫聚贤是开启中国区域文化研究的先驱,吴文化研究成了中国区域文化的第一家。

吴越史地研究会汇聚了当代学界耆宿名流，如蔡元培、钮永建、吴稚晖、于右任、叶恭绰、马叙伦、吕思勉、郑振铎、周予同、阿英等。于吴文化研究发起之际，这一学术阵容，研究群体，辉煌煊赫，足征吴文化研究之地位，也形成了吴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研究的社会化。

吴越史地研究会成立时间虽不长，但确建立了出色的历史功绩。同时走向社会，深入到吴地各城市建立分会，聘请各地教育界的领导和教员担任调查员，并在各地举办出土文物展览会，举行宣传讲演。这反映吴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为学术走向民间开创了一个好榜样。吴越史地研究会，阐述了吴文化地区是中华文化发源地之一，早在六七千年以前已有很高的文化，这是当时增强民族的自尊自信，击破帝国主义的文化心战，显示了它的现实性和战斗性。

卫聚贤和他一手创办的“吴越史地研究会”提出了明确的学术概念，指出了时空界限，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民间性和现实性的优良作风，为后继者拓开了道路，这些历史功绩应该珍视。

3. 吴文化研究在 50 年代后的发展

解放后，吴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文博部门发掘、清理了不少吴文物，为吴文化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实证。发生了以下几件大事：

1954年宜侯矢簋的发现及郭沫若、唐兰、陈梦家等名家撰文考证，震动了史学界，引发了重新进行研究吴文化的热潮。

1961年学者曾昭燏、尹焕章撰写了《古代江苏历史上的两个问题》对吴文化研究作了全面评述 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引起了文博考古界和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吴地考古发掘的规模展开，历史文物的大量出土，把吴文化不断引向深入，揭示了先吴文化时期吴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传承关系。

1983年江苏省成立了“吴文化研究会”。1989年改称吴文化学

会。多次举行了吴文化学术讨论会，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历史疑难问题逐渐解开，吴文化历史源流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出来。吴文化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然而，我们应注意到，这一时期的吴文化研究不过是 30 年代的继续，吴文化的内涵仍主要停留在对先吴地下发掘器物的研究，以及对先秦吴国的物质、精神文化等的研究。研究队伍基本上是以考古界为主，其方法也是以考古成果为主进行实证的研究。

三、现状

（一）吴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吴地区域性大文化和资源论概念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首先取得成功。吴地的无锡县（今锡山市）堰桥镇成为农村改革的先行乡镇，引发了乡镇企业的勃兴，率先成为亿元镇。农民富而思乐、富而思文，因此办起了全国第一座展示吴地文化的主题园林——吴文化公园。由于建园的需要，进入了吴文化的研究领域。所以我们一开始对吴文化研究称之为“探索”，对建设吴文化公园称之为“尝试”。

80 年代在经济改革大潮掀起的同时，也掀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热潮，这使我们对民族文化和中国的前途进行了反思。因此，我们的吴文化研究就是在这广阔的背景起步的。

我们所研究的吴文化，名之曰吴地区域文化。主张把吴文化研究，从过去单纯局限于对春秋吴国以及相应的考古文化这一狭隘的范畴中跨出来，走向吴地区域性大文化的广阔领域。我们认为这一概念，体现在三个方面。

吴地通史概念，即从古到今，坚持把历史作为一个流程，进行全方位的动态考察。我们认为历史是昨日的现实，当今是正在变成历史的现实，未来是现实合乎规律的发展。吴地从原始蒙昧发

展成今天的繁荣富裕，是一条完整的发展锁链，它必然含有内在的规律。鉴古知今，总结其成功的经验，避开失败的教训，回过头来为社会服务。因此，我们坚持进行历史性的纵向研究，这是我们提出的以历史为经的研究是大文化观的第一个层面。

吴地大文化层面。我们从服务社会的宏观要求，和建园的展示要求，以吴地人民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各个剖面为纬，构成大文化观的第二个层面。

吴地社会深层研究，我们从吴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社团、行业、宗教、信仰、心理、礼仪、民风民俗等深层机制构成第三个层面。

大文化观的实质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对吴文化进行综合考察与研究，也是当今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广义吴文化的概念；同时也是30年代开创的狭义吴文化研究的发展与继续。学术界称之为吴文化研究的第二个台阶。

这一学术概念的出台得到了史学界著名学者的积极赞成。如吴泽教授、李学勤教授、茅家琦教授、刘家和教授、段本洛教授等，多从不同角度撰文表示支持。更应提及的是这一概念提出后，学术界出现的争鸣，是在一种平等、民主、求实、真挚的情况下进行的，避开了门户之见，体现了吴文化开放融合的特色。

（二）吴文化资源论的提出

在大文化观这一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把吴文化作为资源来认识和研究。我们认为吴地的发展，是一代又一代吴人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而这种财富凝结成知识传递给后代，这种知识我们管它叫文化资源。吴地为什么至今富甲天下，成为中国发展最有希望的地区，很重要的因素是这份资源富矿在起作用。这座富矿需要我们去开发它。譬如说：吴地地少人众，但却成为国中之粮仓；吴地缺少自然资源，但却成为工商发达、锦绣繁华之地。总之，从物质到精神，从生产到生活，从思想到民俗，吴文化是一种宝贵资源，它体现了民族传统和民族色彩。研究它，开发它，运用这些历

史信息，为当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将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吴文化区域界定

我们研究的吴文化区域是以太湖流域为腹心的宁、沪、杭三角地带，以太湖为躯体，以南京、上海为首尾，苏州、无锡、常州为中心地带，杭州、嘉兴、湖州及长江北侧的南通、扬州等地区为节肢。即当今习惯上称呼的长江下游金三角地区。

这一界定是既考察了历史地理的演变，如从先秦考古文化的发现，吴国疆域和以后的吴地区域演变所进行的综合考察，以及对吴语文化分布区的考察，同时对吴人心理性格、民风民俗等进行多方面探索所得出的结论。

吴文化地域环境，占着一个绝对有利于开放的地理位置，它的东面是世界第一大洋——太平洋，它主要区域分布在中国第一大江长江以及另一大江钱塘江的出海口，这些河道上溯下游贯通半个中国的富裕地区（古统称江南）太湖作为这个区域的中心，进行了整个区域的调节，大大小小的内河（包括大运河）使整个区域在帆影橹声中畅通无阻。因此吴文化地区在古时成为输出中华文化的窗口，对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近现代又成为吸纳西方先进文化的基地，这样优越的地理环境产生了灿烂的吴文化。

（四）吴学研究“经世致用”的传统的继承和运用

提倡变革。注重民生，以改革推进社会发展是吴地吴人经世致用的传统。从北宋范仲淹力主改革朝政，推行新政，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到明朝崛起于无锡的东林党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朝政、抨击贪官污吏，主张改革朝政。

明末清初的昆山顾炎武，提出了发聋振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言壮语。

出现在清朝乾嘉年间的，常州人庄存与、刘逢禄创立的常州学派，他们以公羊三世说的变易思想为中心，针对时弊，主张经世致

用，这对扭转当时脱离现实的考证学风，对晚清以来的思想影响很大，如后世的著名思想家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都受这一学派的影响，成为一代变法的巨擘。

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集中表现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变革思想 苏州冯桂芬的言论著作《校庐抗议》如石破天惊，对促进变法起了巨大作用；稍后的苏州人王韬，继冯传播西学，在政治上鼓吹“君民共治”在经济上提出“商为国本”“兴利富国”等系列改革主张，他还继承吴文化崇教育才的传统，呼吁兴办新学体系；无锡人薛福成把洋务视为经世要务，他主张吸取西方文化的长处、主张变法行君主立宪，在经济思想上，主张商民自由集股成公司，正是在这种文化精神薰陶下，吴地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达地。

经世致用在吴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注重实学、注重科技的传统，使吴地的发展后来居上。

先吴出土文物中反映了吴人智慧之光，他们创造的水稻文化、蚕丝文化、陶瓷文化、玉石文化、舟楫文化、建筑文化以及青铜文化，都是超绝世界，改造自然的文化杰作。

农耕上江东犁、水车（翻车）的发明，保证精耕细作的农具发明制作，科技兴农在古代就开始了。北宋的郑亶父子、单镈等对水利的研究和著作，为吴人开万世之利。元朝的松江人黄道婆，发展了吴地的纺织技术，使吴地机杼遍布，成为衣被天下的纺织之乡。建故宫的大匠蒯祥，发展吴中园林甲天下的文人和匠师，明末的徐光启引进西方历算，以他的《农政全书》成为中国历史上四大农学家之一。同时吴地出了中国奇人徐霞客，出游 30 余年，足迹遍天下，出生入死 进行科学考察 写出了巨著《徐霞客游记》对中国地理学作出了空前的贡献。无独有偶，生于清朝初年的无锡人顾祖禹、踵霞客之迹，写出了《读史方輿记要》，在地理学上创造了又一高峰。

进入近代，洋务派提出要“师夷之长技”。吴文化地区可说是

得风气之先，不少知识分子要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东渡西行，赴海外学习新的科学技术，同时在国内办同文馆、制造局、办新学，吴文化区都走在全国之先。涌现了不少杰出人物，如无锡数学家华蘅芳、华世芳兄弟，化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都对引进西方科技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重科技、重工商、重教育，使吴地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新型人才群——近代工商界集群，推动了中国向近代化迈进。

（五）吴学研究成果的应用与发展

从“资源论”的研究出发，对历史信息的综合与传递，受到地方领导决策者的注意与采纳，有以下几方面。

1. 三次辉煌和三个发祥地之说

首先，3100年前，在中国陕西岐山下周部落的王子太伯、仲雍，为了让王位给弟弟季历，带着中原的农耕文化，南奔梅里（今锡山市梅村镇）与当地土著荆蛮结合，建立了句吴古国。他开凿伯渎港，教民筑城廓，建房屋，提高耕作技术，开发了江南经济，开启了东南文明，开创了吴文化，使无锡成为吴文化的发祥地，创造了第一次辉煌。

其二，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明清两代，无锡的农业、手工业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商业发达，活跃了市场经济，出现了举国闻名的四大市场，米市、布市、丝茧市、金融市，为发展近代工商业准备了资本和市场。他们派出了一批人才，东渡西行，赴日本和欧美留学，归国后成了办厂的技术骨干。从本世纪初到30年代末，以面粉、纺织、缫丝为骨干的工厂像雨后春笋出现在无锡大地上。无锡从一个普通的农商业县一跃而为全国第三工业城市。涌现了一批杰出人物，创造了第二次辉煌。

其三，乡镇企业的发祥地。从本世纪70年代起，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凭着发展工业的历史经验、人才优势、丰厚的文化积淀，依仗像水一样流动的活力，无锡人求实、创新、争先的精神，敢为天下先，创造了乡镇企业，千村万落办起了各种工厂，经济迅猛

发展,无锡县、锡山市三次被评为中国第一县,架起从小康通向现代化的桥梁,创造了第三次辉煌。

2. 太湖旅游资源的开发研究——无锡人吃太湖

太湖浩渺三万六千顷,灌溉着吴地苏、松、常、嘉、湖数十县的沃土、富甲天下,成为明清两朝赖以给养的生息之地。本世纪初无锡人成功地开发了太湖旅游资源,在湖边建成了鼋头渚、梅园和蠡园,形成了名闻中外的太湖旅游区。开创了现代旅游业的先声,无锡几乎成了太湖的代名词。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吃太湖”的理论为很多地方决策者所关注。沿湖周边县、市,都纷纷以大量投资进一步开发太湖资源,集太湖自然风光与人造景观于一体,形成更大规模的太湖游览区。

3. 无锡三次造园说

园林建筑艺术是吴文化苑中的奇葩,无锡的园林文化独具社会意义。在全国造园中独创风格,有时代的率先精神。

建于明末的寄畅园,为大官僚秦金的私人苑林,清初康熙、乾隆皇帝五次南巡,都以此园为行宫。乾隆还照样在颐和园中建了谐趣园。寄畅园因此被评为国中四大名园,创造了封建时代造园的杰作。

在本世纪初由荣氏兄弟建造梅园,杨翰西建造鼋头渚(横云公园)、王禹卿、陈梅先建造蠡园、渔庄等是无锡造园的第二阶段。这些园林不再是供少数达官贵人享乐的后花园,而是供民众娱乐的公共园林。这些园林不仅按传统的造园艺术营造,而且注入了时代的文化色彩,把自然景观与人造景观相融,适当引进西方建筑,使中西文化互相映照,形成新的时代风采。更突出的是将这些园林从湫隘的城厢移向浩瀚的太湖,形成了气势宏大,深化了园林文化的主题,显示了吴人与世界潮流对接的气魄与宽阔的胸怀。同时开创了造福桑梓、与民同乐的公共园林的先声。

吴文化公园及周围市镇兴建的农民园林和文化景观,构成了无锡造园的第三阶段。吴园建园十分重视前人的造园经验,自觉

意识到它是代表当代中国农民的，农民不仅在经济上超越前代，创造有特色的经济大业，而且要创造与之相适应的园林文化。它坚持以巨大的规模，以特色文化为主题，集园林、教育、艺术、娱乐的多种功能于一体。坚持高起点的总体规划，求实地坚持质量，量力地分期实施，建成乡情国情教育的大课堂，吴文化的展示场所，以文化陶冶娱乐的旅游胜地，以园林景色吸引人的休闲区。

4. 跨世纪文化工程的研究与实践

因吴文化公园在国内是首创，作为国内第一座文化主题公园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仿效，我们只能边学习、边研究、边建设、边总结，我们既从吴文化的深度与广度作宏观性的探索，又从建园的设景布点作微观性的尝试。我们从总体上确定以吴地大文化作为框架搞展示规划，由于它内涵丰富，必须要有宏大的规模与之适应，所以我把它称为跨世纪文化工程。从时间跨度 1984—2010 年分四期工程进行。

吴文化公园将以文化博览的形式，展示吴区域的高度发展的物质文化，绚丽多彩的人文文化以及风姿独特的民俗文化，对广大观众进行乡情国情的教育。

（六）吴学研究在理论上的拓展

1984 年建园，1991 年建所。园、所的关系已在文中论述。因建园的需要办所，办所后首先要正确认识和研究吴文化，才能保证公园内涵的丰富和正确地体现特色，再在更大的层面上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1. 我们提出了“今日的文化、明日的经济”。中国经济改革求致富之路，是主流，但深层是个文化问题。中国社会未来的结构、国民意识、国民素质等问题，经过文革出现的文化断层，大量社会问题的暴露，诸如“一切向钱看”引发的种种社会弊病，本质上是个文化问题。归结为国民精神的重建问题。重视“两手抓，两手硬”不是口号上，要从思想上落到实处，这同样是决策者精神素质的问题。

2. 我们提出了“学术走向民间，研究面对现实”的指导研究的方针。我们不仅在多篇文章中阐述了这一方针的基本观点，并且得到学术界和各级领导的热情支持。这一方针使我们从理论探索到联系实践，扣住现实，有的放矢，既从象牙塔里走向田野、工厂、社会，又在理论上作了求实探索，使这一学科从闭塞的领域里跨了出来，深化了它的理论体系。这些成果，由于切近社会，受到各级领导的欢迎和引用。

3. 三座金桥的观点，吴文化本身的开放性和改革性，以及它要为时代服务，因此，我们提出了要在研究和展示中架通三座金桥，即“历史与现实 文化与经济 海内与海外”。如我们已在文中论述的吴地后来居上的发展历史，与当今突出的经济地位的历史联系，又如我们多篇文章指出的人才与经济的历史事实；再加我们对海外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对在海外创业的许多杰出人物的研究，和立塑展示，起到了沟通海内外的良好效果。引来了海外赤子的爱心，缩短人为阻隔的距离。

4. 做朵迎春花的观点。吴学研究所是起自民间的一个学术组织，我们一开始就把自己看成是开在乡间路边篱笆上的迎春花。我们多次申明“俏也不争春”，引起百花齐开放是我们的夙愿。我们认为吴文化是水的文化，本身就包容百川。我们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争鸣，我们不立门户，我们以文会友，埋头苦干，虚心学习。这些年来，我们与学术界朋友切磋相长，也得到很多学者扶持。

（七）依靠社会力量办研究

吴学研究从小到大，现有专职研究人员 9 名，其中有退休的大学教授、研究员、中学教师、史志编辑，多数是老学者，有一定的研究水平，青年助研人员 1 名（高中毕业生）。要担当研究理论和建园内容的任务力量是不够的，但我们多年来采用一条“借人才”路子。我们认为诸葛亮能借东风，借箭，借荆州等，但独独没有借人才，使蜀国后期人才凋零，一败涂地。我们的借人才是有计划、

有组织地借。

1. 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搞联合研究

我们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原历史系）签订了联合办园办所的协议，该校建立了吴文化研究室，在组稿、出版、组织学术界力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我们与上海同济大学的 1984 年签订了设计咨询协议。以吴地园林建筑文化为依据，设计了明清风格的殿、堂、亭、台、楼、阁、轩、廊、坊、民居等，包罗吴地各种风格的建筑，形成蔚为壮观的吴文化建筑的复原群体。

与上海华东师大史学所签订了联合办所的协议，合作编辑了“吴学研究专号”。

与上海交大船舶系、同济大学桥梁系联合筹建了吴地船舶史馆。

我们还与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江苏省历史研究所签订了联合办所、联合搞专题研究的协议。

我们与中国社科院、先秦史学会联合举办全国性的吴文化研讨。

还与中国农史学会联合举办了吴地农史研讨会，同时还与中国农业博物馆签订了把吴文化公园作为中国农业博物馆吴文化分馆的协议。

同时我们还与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共同筹建了“吴地方志馆”，与上海文史馆联合办了 5 期《上海文史》吴文化专栏。

最近我们又与江苏省社科院《江海学刊》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这种公民和团体联合搞科研的做法，突破了体制上的限制，各自发挥了自己的长处，调动了两种积极性，实现了互补。又在一定程度上抑止了一切向钱看的倾向，树立了良好的研究学风。

2. 成立了学术顾问委员会和组成了兼职研究员队伍

吴地人才辈出，吴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内聚力，使一些

身于吴地或与吴文化有各种渊源的精英人物，对吴文化研究具有强烈的兴趣和深厚的乡谊。因此，吴学研究得到了高层次的学术界人士的关注与投入。

以陆定一同志为总顾问的学术顾问委员会拥有 129 位顾问（内兼研究员 27 名），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周谷城、费孝通、王光英、钱伟长等；有学术界耆宿苏步青、匡亚明、任继愈、谈家桢、李国豪、李侃等；有著名史学家吴泽、李学勤、茅家琦、梁白泉、戴逸、赵光贤、刘家驹、段本洛等；有著名教授钱仲联、卞孝萱、金开诚、陈从周等；有经济学家陈翰笙、薛暮桥、薛葆鼎、卜明、秦柳方、吴大琨等；有艺术家华君武、周怀民等；有教育界著名人士李文海等。

共有兼职研究员 133 名（内兼顾问 27 名）都是中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网络遍及全国，是吴文化研究中最有活力，最生机勃勃，最出成果的学术群体。吴学研究近年来硕果累累，主要依靠了这一批学术力量。在这些兼职研究员中，已出版了图书 27 本，成为近年来吴文化研究最丰盛的收获。

3. 吸引地方领导参加吴学研究，是发展学术研究的一条新路。在中国特定的体制下，学术活动必须取得领导的支持才能得到发展。吴研究所是一个民间学术机构，但却有较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我们有一条成功的经验，争取领导参加感兴趣的学术活动；争取领导到会讲话，争取领导发表文章，争取领导运用学术成果。通过争取来促使领导关心支持学术研究，从自发到自觉运用学术研究的成果转化成为科学的决策思想。

4. 吸引社会热心人士支持研究。由张金海组建的吴文化研究促进会从 1994 年正式成立，对吴文化研究起了促进作用。

（八）研究成果

多年来，我们坚持少说多做，不图虚名，文人相重，多交学友。因此，成果不少。

1. 研讨活动。大、中、小型配套，外地举办和本所召开交叉进行。联办研讨，主动操作。研讨质量日益提高，研讨成果得到

实。研讨活动向专题化、系列化发展。

研讨会：在北京举办过两次，上海举办过 4 次，全国性的大型专题研讨活动两次，吴文化研讨年会 4 次，还有小型研讨活动多次。

2. 结集成果：我们是在无钱、无单位出版、无专业编辑力量、无发行渠道的情况下起步的。我们采取了两条措施：

(1) 借鸡生蛋与《东南文化》、《文史知识》、《历史教学问题》、《苏州大学学报》合办吴文化专号。与《上海文史》合办吴文化专栏 5 期。

(2) 养鸡生蛋：独立出版吴文化理论丛书《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

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37 万字。

第二辑：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47 万字。

第三辑：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45 万字。

独家编纂出版《吴文化知识丛书》：

第一辑 9 本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77 万字。

第二辑 9 本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73 万字。

第三辑 9 本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74 万字。

1997 年编辑出版《吴文化艺术丛书》。第一种《吴地三百六十行》画册，已由上海画报社出版。

3. 办好《吴文化博览》。从开始办油印的《吴文化通讯》到办铅印的《吴文化博览》这是一大跃进。《博览》栏目多，信息量大，发行量增到每期 1000 份，达到了沟通信息，成为宣传吴文化的阵地。

4. 建造了万卷藏书楼和成立了吴地方志馆。我们与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和锡山市地方志办公室联合举办了吴地方志馆，征集吴地各种方志，这种公民合办的地方文献的集中储藏，开创了编好志用好志的新路。

藏书楼拥有多种大型类书共计 7000 余册，。此楼由香港胡法光先生捐助建成。胡还捐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一套。这一举措